

新文學的平佈與形式

韩毓海 著



希望看到这样一本书

(代序)

谢冕

在以往的叙述中，中国新文学是中国进入现代社会之后的社会各种情状的说明史。人们坚定地运用文学反映社会生活的观念来评估这一阶段的文学价值。这是数十年来一直在批评中起决定作用的理论视点对文学研究产生的惯性影响的结果。这又不失为新文学研究的一种思路，它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但是却并非只能如此的思路，文学研究期待着来自多个侧面的观念与实践。

中国新文学的创始者一代，大抵是19、20两个世纪之交的中国知识者。他们承载了中国深重的苦难，并且充当了中国在新世纪曙光之中创造光明的角色。他们把这一切的思索、追求和憧憬都倾注在文学创造之中，这就造成中国新文学的浓重的历史使命感和启蒙主义的色彩。中国新文学无疑是这一代人以及他们的继承者充满忧患而又充满激情的心灵投射和烛照的精神创造物。

本书作者选取了一个新的理论角度，他从现代作家——这些以文学为“手段”的知识者，显然是知识者之中对于所处时代的脉动感应最为灵敏的那部分人——的心理结构模式，以及由这些模式决定而采取的诸种抒情形式切入新文学的历史。这也许会带给这一研究领域某种新的气息，或者说这是一种新的尝试。在这自主的理论构想的背后，巍然屹立着为时代的风暴所唤醒的文学精神。把文学的创造者放置在一个大时代的宏阔

而纵深的背景中，从时代赋予他们的精神烙印入手，揭示文学的新鲜品格及其局限，这也许会从一个人人们陌生的角度给予文学研究以新的启示。若能如此，这本书将丰富并更新我们的文学史研究的效用是不应怀疑的。

对韩毓海此刻进行的思考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他对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位置及其超乎实际可能性的社会承诺提出严肃的质疑无疑是有力量的。他描写了他们心理结构中的对立和分裂，由此引申开去，他分析了他们中的代表者的若干经典性的文学抒情形式。作者对中国知识者的生存状态的描述而有其独到之处，即他们受现代社会的启示，自觉充当了中国古老文明的批判者甚至叛逆者的角色，但他们实际上也无法进入现代西方文明。中国近代以来面临的社会危机所造成的知识者特殊心态与他们所使用的学说和方法之间的位差，造成了近百年来中国知识界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而他们矢志不移的坚韧却令人嗟叹——作者每每透露出的不无感伤的激情大抵源于此。

学术的发展总是体现为后人对于前人的挑战。一个见解的提出只要能透出事物另一面的光亮，它不必希求他人的认同便具有某种意义、价值和功效。尽管那些论点可能是未见“全面”和“圆熟”，所谓的学术民主精神，理所当然地包括平等、容忍和竞争，当然，这一切应以是否具有科学性为前提。本书在中国进步知识者中对于五四传统精神的理解和态度的分析方面持有一种尖锐的见解，这种意见的新颖也许会促使我们从异向思考我们习以为常的秩序。在学术上众口一词并非健康，不时有异质的加入并习惯于承受这种加入方能常得思维的健全状态。

韩毓海的专业是当代文学，他把思考的某些重心放在“五四”新文学的传统之上，对此我想并没有什么不好。中国当代

文学学科的建立，是当代文学的成熟和丰富使然。在五六十年来，它只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个很不重要的附属，直至七十年代末方才以独立学科的形态出现在科研教学领域。对于当代文学而言，它虽然因长期的扭曲而呈现了对新文学传统精神的某种变异，但它毕竟属于五四新文学的谱系。新文学的基本精神和素质都在这里得到了延续和发展，尽管在它的歧异的过程中也有许多消匿，我们的目标在于促进中国文学在现时代的发展，为此我们便需要在历史的对比中得知我们所处的位置：这便是前进与追寻；在这个过程中，增多和发展了什么，而削弱或消失了什么。

将当代文学从现代文学中分立出来，是当代文学的日益自立和完整性使然。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它取得了重大的发展进步。但我们却日益感到匮乏，且日益希望把它还归至新文学的整体性中予以观照。本书并未论及当代文学现象，但对于中国新文学独特视点的切入开创了理论的新界面，它在新文学发展的诸多层面的展开，有不少精彩的论点，这些实绩的取得无疑为这一学科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经验，尽管即使在理论建构中它仍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

在当今的新文学研究中，现代部分与当代部分的隔离现象仍然存在。从事现代研究的往往划地为牢，不很理会五十年代以后直至九十年代新文学的发展。从事当代部分研究的，一般也不甚顾及历史的来路，从而寻出今日发展的昨日依据。因而把五四运动迄今的七十余年，甚至把戊戌变法迄今的近百年的文学历史放置在中国两个世纪之交的巨大背景上来省察，哪怕只是粗略地勾画出这一历史阶段文学发展的大体轮廓，以至于写出这样一部具有宏大整体感的中国新文学的百年史便成为我们的殷切期待。

本书作者现在所从事的工作，暗含了我们的这种期待。把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视野上溯至上个世纪末的社会、文学背景中去，作为中国新文学产生和准备工作的考察，再把它从五十年代一直延伸到这一个世纪末，作为对于那个伟大开端所创造的文学世界的未来展示的追踪，这意味着对于中国新文学从孕育、诞生、发展乃至其间的变迁的整体史论框架的调整和强调；撇开这本著作的学术建树不谈，单就提供的这种视野，这种范式以及这种可能性便是十分鼓舞人的。

本书作者治学有一种可贵的激情投入的精神，他笔下所叙往往带有强烈的历史共震；这对于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文学史的人来说是很重要的，这一百年提供给中国知识者的是无边的苦难以及由此引发的深重的忧患感，作为这段历史的叙述者，冷漠则近于残酷。当然治学毕竟是治学，面对事实，一种冷静和科学的态度不是不必要的。我以为作者基本上对此处理恰当，在他机敏、智慧的叙述后面，有一种不无悲哀情调的沉思，而对历史的倒退和弯曲，他更有一种愤激，这种愤激，有时又化为一种凝重的批判精神。

在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博士研究生中，韩毓海大约是最年轻的一位。中国的青春是值得羡慕的，有时这甚至包括过早地承受危难与挫折。我曾说，我不崇拜青年，但我崇拜青春的热火。长沟流月，寂然无声，但流向远方的水希望有不竭的后续。这也可以算做我个人对他的期待。

1991年6月8日于畅春园

“五四”知识者的心理结构模式与 话语形式

(代前言)

去年深秋的一个中午，友人王君与辽宁教育出版社的魏运佳先生到我拥挤的宿舍来，谈了出版我的博士论文的意向。魏先生看了当时十分零散，的确还只是一件“毛坯”的初稿，给了我极大的鼓励和鞭策；应该说，这本书稿成为现在的样子，首先是与魏先生的努力分不开的。

选择“五四”新文学这样一个题目，是近几年一直冲撞在我心头的强烈愿望，正像书稿里写到的：

“五四”是中国近代文化的终结，现代文化的开端。作为中国现代精神危机的凝结物，它成为一个巨大的空间黑洞，被每一段时间（历史）所吸附、延展和阐释，而且仿佛作为某种共时性的永恒，与时间的绵延一道，成为现代历史构架的纵轴，在此后的70年中不断复现自身。早在“五四”30周年的时候，罗常培先生就曾强调，总是重复“五四”的老调子是不智的；然而，不容回避的是，“五

四”虽然已成为历史，但由中国现代的各种危机构成的精神冲突依然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基本心理模型。研究这些模型因此便具有鲜明的当代意义。

在此我还要再补充一点，这就是即将到来的 21 世纪，意味着“五四”现象的进一步延续还是意味着它的终结？显然，在 20 世纪的最后 10 年里，这是摆在我们这代人面前的极为深刻的时代课题。

应该说，面对着这样一个“大题目”，我不得不承认自己全部精力和学术视野的有限性。所以在写作中我只能“有所为”而又“有所不为”。具体说就是：像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那样综揽全局的方法是我力所不及的，况且这种方法也有它的局限性，这便是，一旦搞不好会因要顾及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而陷入盲目性和纯粹外在化。而我所选择的研究方法和角度，则既不是以单一社会经济变动为中心和线索的角度，也不是以单一的思想文化（上层建筑）运动为中心和线索的角度，而是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大概念集团的边缘交汇处，即知识分子“心理结构模式”来切入“五四”新文学。胡适曾经指出，“心的作用并不刚是照相镜一般的把外物照在里面就算了……没有一种心的作用不带着意志和兴趣的，没有一种心的作用不是选择去取的。^①所以，我的方法是研究知识者心理结构的形成与特定的社会历史状况的密切关系，特别是这种心理结构对于特定时代意识形态的形成和运作所起到的选择、构建作用；而中国新文学独特的“话语”形式（包括作品的叙述模式，作家独特艺术个性后面掩映着的普遍的语气系统等等），都是建立在这种特定的心理结构模

① 《胡适文存》第 1 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 年第 1 版，第 2 卷，第 93 页。

式之上的。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心理结构模式的形成，与中国现代社会的具体形态以及知识者在这一形态中所处的独特地位密切相关；这就是书稿中所关注到的：

实际上，那些具有超前意识的现代知识者，当他们与相对滞后的中国现实需要发生矛盾抵牾的时候，他们自身必然会发生人格的分裂，这种人格分裂导致的一般结果是知识者自觉地牺牲自身的个性意识，将自己纳入整个现实的具体需求之中。现代知识者习惯于将精神与现实的存在分裂为截然对立的两大块（A/B，启蒙/救亡，自由/责任，个体/群体，近代人道主义/传统人道主义）并将其理解为一个“压倒”另一个，一个为另一个“牺牲”的模式。不难看出，这种人格分裂的心理结构模式，其实是一种自我压抑的心理结构模式。

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心理模式呢？这是因为：

中国知识者在历史本文中扮演的传统角色总是导师和医生，这种角色在现代社会中的延续和强化，决定了他的话语必须坚定、准确、清晰并且具有保证作用，即历史总是需要他们提供权威性的或权力性的话语，而不允许他们摇摇摆摆，模糊朦胧：要么自外于历史潮流，经营自己个性化的“小圈子”，作一个甚至永不被人理解、永远无法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价值的纯粹学者，要么破坏“小圈子”，走进现实的洪流之中。而且，历史也从来不允许他们站在许多理论、学说的边缘交汇处彷徨流连，而是要求他们坚定地站在一种理论、学说的中心处，大声且鲜明地呐喊出

哪怕是偏激的声音。而这样一来，当他们处在某一理论的中心，制造出某种斩钉截铁的“权力话语”的时候，这种权力话语在未规范整个社会之前，已率先压抑了他们自身。

在这种二元分裂、对立的心理结构模式之上，形成了中国现代启蒙主义的经典话语形式，它在逻辑选择上，必定是于两项对立之中坚定地高扬、选择其中一项，而在情感取向上，也同样是爱憎清晰，等差分明；例如陈独秀的文学革命“三大主义”正是如此：

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立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

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立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

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立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现代启蒙主义话语的一般形式，就是这种“两项对立的等级模式”，而这种话语形式其实则是建立在现代知识者二元分裂的心理结构模式之上的。

如果说，从社会——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知识者所处的先觉者的地位与相对滞后的中国社会现实的矛盾，造成了他们人格心理的分裂，那么从传统的东方心理结构模式本身来看，那种“以情入理”，“化理为情”的伦理化的心理模式，在“五四”时期也得到了进一步强化：“五四”知识分子大都具有的理想主义的热情和浪漫主义气质，与那种冷静而理智的科学主义认识论之间，总是难以合拍。这一方面造成伦理主义的情感纠葛，始终使他们难以达到或保持类似西方知识分子纯粹“静

观”的人生态度 (*vita complativa*)，同时另一方面，正是寻求“情与理”，认识与价值的交融、统一这种回归传统心理模式的内在趋向，吸引着现代知识者由内心的分裂走向意识形态化的内心整合。

这种“情”与“理”，认识与价值相冲突的心理模式，同样对“五四”知识者的话语形式产生了影响。情感对于理智的压制，伦理主义对于科学认识论的融合，必然导致统一的话语形式中存在相异的两套语气系统的纠葛，从而使叙述者成为一种“清醒的说谎者”：即一方面，启蒙主义者的清醒的自我意识，时刻“使说话人与他认为自己应该成为的人协调一致”，并且要时刻考虑到（话语）对受话人的影响，即“考虑到他人的情感”；而另一方面，知识者自我被压抑的个性意识又会不断地对这种启蒙主义表层意识产生威胁，并从这些意识的空隙中涌流出来，这样，在“五四”统一的小说本文中，我们则会看到两种不统一的话语形式，即建筑于意识表层的启蒙主义话语和建立在潜意识深层的现代主义的话语。

在“五四”知识者中，凡是坚定地采用着启蒙主义话语的，都是较多地关注于中国社会现实本身的状况，而且受中国传统文化氛围浸润较深者。所以相对来说，所谓知识者的超前意识与相对滞后的现实之间的固有矛盾，在他们身上体现得并不十分激烈；他们对于自我内心矛盾分裂的体察也比较弱。但是，像前期鲁迅那样同时彷徨于两套话语之间的知识者，则是对于内心分裂的体味比较深切，内在张力较大的知识者。而那些与现实距离较远（或刻意保持着与现实的某种距离）的知识者，往往受现代思潮的浸染较深，他们总是力图避免介入时代或某一理论学说的中心处，而处处显露一种对于一切形而上学倾向，具有批评和挑战作用的姿态，他们的话语形式便与前二者不同，即往往是恬淡客观，注重语气形式和语言本身的灵性和韵味的，胡

适为代表的“自由知识分子”大致如此。结合新文学的未来发展研究这类知识分子的追求和挫折，同样具有深刻意义。

总之，本书研究的重心是中国知识分子独特的心理结构模式和建筑在这种心理结构模式之上的独特的话语形态；而且我认为，这些心理结构模式在我们自己，以及在今天的知识者身上同样存在着，这样，我就不是把它们当作已经过去了的“本文”或客观“对象”，摆开距离去考察，而是在进入“五四”氛围的同时，体味到我自身生命的存在。所以，我无意从主——客二元论的立场去刻意地追求“客观”，而是努力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处消解这种“主观”、“客观”之分。这正像一位朋友所说的：“至于工作范式的建立，是作者的理论兴趣与研究对象特性之间的相互契合，有理论假设的成分，但并非纯粹先验的主观臆想。在‘前研究’阶段，理论假设与对象把握不断对话，互相调整，很难再分辨什么‘主观’、‘客观’。”^①因此，我不想用一种纯粹主观的理论框架去套文学现象，也自知不可能去达到对于文学现象的所谓“纯客观”把握，我之所谓不同于“主体”与“客体”的“本体”，其实就是指“五四”以来一直存在于我们之间的知识者的心态；所谓“形式”或“符号”，其实就是指建立在这种心态之上的独特的话语运作方式。

在体例上，我则主要是着眼于文学现象和文化运作的多元化，普遍性，从后来文学的发展、变异和重构来把握文学史现象的地位和作用，而不拘泥于“主流”与“支流”的划分，所以我是赞成在写作体例上“消解大家”的；而之所以用了三大部分来写鲁迅、郭沫若、胡适，也并不是出自把某位作家定于一尊的权威主义思路，而是着眼于在个案的剖析中，把握上述最具普遍意义的作家的心理模式和话语形式。

^① 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壹卷·卷后语》，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9月第1版。

当然，在这部书稿中，我主要还是从社会、文化因素与心理结构的关系的角度切入心灵的和艺术形式的世界的，至于将纯粹生命本体分解为横向“生欲”、“性欲”、“死欲”，以及与之相联的纵向的“本我”、“自我”、“超我”的精神分析的方法，和建筑于其上的符号学方法，只是在“郭沫若”一部分中有所尝试。如何实现社会学、精神分析和符号学角度的有机结合，是文学史理论框架进一步走向深化的未来趋向，在这方面显然还有许多工作需要作。

我相信，在人的一生中有些因素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所以，我特别要感谢伟大的“五四”精神的摇篮——北京大学对我的培养和熏陶；我尤其感激我的导师谢冕先生，正是他启发我将自身的生命存在和选择，与“五四”先驱者的心灵和追求实现沟通和对接；——这些感激都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

我谨以这本小书，来纪念伟大的“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并以这菲薄的礼物，献给我的母校，献给那些为中国和中国文学的进步不懈追求和探索的人们。

1991年3月8日夜

目 录

希望看到这样一本书(代序) 谢冕	(1)
“五四”知识者的心理结构模式与话语形式 (代前言)	(1)
第一章 导论:文学史的新观念	(1)
一、本体——符号研究的内容与意义	(2)
二、文学史研究的新框架	(9)
第二章 现代灵魂的分裂	(19)
一、认识与价值的冲突	(25)
二、现代小说中“说谎”的叙述者	(29)
三、两种“启蒙”	(36)
四、艺术即形式	(42)
第三章 话语革命	(50)
一、“启蒙主义话语”产生的源流	(52)
二、现实主义话语的产生及背景	(59)
三、现代主义话语的产生及原因	(67)
第四章 寻找意识“迷思”	(74)
一、从“静观”到“介入”	(75)
二、从心理结构的分裂到社会思潮的整合	(86)
第五章 文学创作的“非自由”因素	(102)
一、乡土与母爱:“流亡者”的家园	(106)
二、苦闷与狷狂:浪漫主义在“五四”的 变形	(117)

三、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才子文学的演化	(124)
第六章 内在紧张的自我消解模式：鲁迅现象	(138)
一、鲁迅前期思想的特征	(141)
二、超越启蒙主义的鲁迅	(151)
三、鲁迅创作的终结	(166)
第七章 内在紧张的压抑模式：郭沫若现象	(183)
一、郭沫若与中国现代抒情形式	(184)
二、论郭沫若研治中国文化的角度	(209)
第八章 艰难的“第三种选择”：胡适现象	(224)
一、后现代主义先锋	(225)
二、“两项对立的等级模式”的发现	(229)
三、冷漠的静观：叙述者与历史本文的分离	(234)
结 语 记忆：在“历史的逻辑”与“幻想的逻辑”之间	(242)
附 录 本书所涉及的主要外国学者简介	(245)

第一章 导论：文学史的新观念

一、本体——符号研究的内容与意义

二、文学史研究的新框架

所谓历史感就是超越感，就是揭示时间的线性的发展中的永恒和同一。

过去的几千年里，宗教和意识形态的巨大魅力，曾使人们达到了现实性与超越性的假想的统一。而当这种现实性的统一破灭之后，人们转而在生命本体之中追求人类共同的体验和生命的“永恒原型”。这是现代精神产生的基础。

应该如何认识产生于这种现代精神基础之上的中国新文学？首先必须把什么是“现代精神”谈清楚。马克思揭示了从意识形态到意识“迷思”的转变，我认为存在于本世纪初中国精神中的意识形态的危机值得重视；由这种危机而生的人们对于生命本体的关注，以及在现代/传统，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的对立之中产生的展示生命本体的“流亡话语”，昭示着新文学现代精神的产生，而且它作为相对的“永恒原型”在今天依然具有相当的稳定性。由此，新的文学史构架，则必然表现为对于

人的生命形式和抒情形式这两大要素的关注。

一、本体——符号研究的内容与意义

“理论都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长青。”

——歌德《浮士德》

本书所采用的基本研究方法，可以称为本体——符号学的研究方法。所谓本体，既是指“从整体上把握世界的方法”，也是指人与世界的共同本质。

所谓“从整体上把握”，就是对思维与存在中可能存在的二元对立的矛盾现象的弥合与消解。众所周知，这种弥合与消解的可能性首先是在艺术领域中被展现出来的：比如对于浪漫主义来说，“本体象征”曾是解决当时精神危机的“万应灵药”，即“在象征之内，日常生活中无法解决的一系列矛盾冲突——主体与客体，普遍与特殊，感觉与概念，物质与精神，秩序与自发——都可以奇迹般地得到解决。”^①从整体上把握世界的方法与主——客二元论的推理方法的不同在于，它更带有现象学的直观的特征，更能展示艺术的本质：“象征融合了动与静，混乱内容与有机整体，心灵与世界，它的物质形体是绝对精神真理的媒介，认识这一真理是直接的直觉的方式。”^②

而关于“人与世界的共同本质”，这一本质一向被表述为“生命”、“创造力”等等。正像“生命”不是建立在二元论的基础之上一样，我们实际上不能也无法给时时感受到的生命下一个“科学化”的定义，但生命却能被我们以艺术的方式“感”到（即“直观”到）：“你要么感到生命，要么感不到生命。伟大的

①② 特雷·伊格尔顿著，伍晓明译，《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2版，第47页。

文学是一种虔诚地向生命开放的文学，而生命是什么又可以被伟大的文学所阐明。这一情况是循环的，凭借直觉的，可以抵抗任何推论的。”^①

本体论并非一种神秘的学说。它不过揭示了人类人文思想的核心：即历史的线性发展中贯穿着一些“永恒的原型”，这些原型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不断地复现自身。在宗教的影响衰落后，这些原型曾经意味着特定时代的人们对他们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会永世长存这一神话的坚信，而最终，意识形态的神话亦然破灭了，不过追求“永恒原型”的思路和“理路”却继续存在下来。只是“永恒原型”成为全体人类和一切男女都具有的同样的生命体验，它不是存在于表层的社会“意识形态”之中，而是存在于人类深层的“集体无意识”之中。而对艺术来说，语言/意识形态的关系，必须让位给语言/存在本体之间的关系；正像艾略特所谓，现实性的意识形态话语，必须让位给“带有伸向最深层的恐惧和欲望的网状根须”的字词，让位给可以渗入那些原始层次的扑朔迷离的意象。他的《荒原》暗示的是生殖崇拜，而在诞生、死亡和复活的有力意象中，他深入揭示出资本主义只不过是植根于人类共同本质，是这种本质原型的一种特定的表现而已。

所以，无论是对世界的整体把握还是对于人与世界的共同本质的追寻，本体论都是人类认识论的现代革命的标志。

至于“符号”，人类实际是通过给事物“命名”的方式赋予现实世界以意义的；人周围的世界之所以是“人的世界”，不过由于它是经过人“命名”的符号世界。人对事物有一个基本共同的想法或信念，是因为人们认同一个共同的符号系统。人的观念实际是依靠这一共同的系统来体现、统一的。人类对于

^① 特雷·伊格尔顿著，伍晓明译，《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2版，第47页。